

1472360

山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	赵 瑞 (1)
解放战争时期阎军在太原修筑碉堡的回忆	刘奉滨 (72)
阎锡山使用干部的手腕	王尊光 (76)
中国公民党在山西昙花一现	王家驹 (81)
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接收京津之经过	南桂馨 (85)
陈采彰起义史略	贾子特 (95)
我参加洪汉军的亲身经历	李思信 (102)
长治、高平的干草会	李天德 李明吾 (105)
忻代宁公团的形成和结局	赵承绶 (111)
辛亥大同的守御与和议	彭继先 (117)
李国华的生平	李国聘 (120)
清末陆军学堂编制概况和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历	周 玳 (122)
太原起义和河东光复的片断回忆	薛笃弼 (130)
《河东日报》和《共和白话报》	马鹤天 (138)
山西保晋矿务总公司和大同地区煤矿企业	侯德旺 王思贤 (142)
新霍女界同盟会宣言	竹 园 藏稿 (157)
南桂馨、荣福桐谈山西国民代表劝袁世凯登基	王尊光 郑元麻 笔录 (159)
回忆戒辑	王尊光 抄录 (161)

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

赵 瑞

本文打算对阎锡山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作一系统的叙述，由于笔者知道的和收集的材料不够，还不能说是他这一活动的全貌，希望亲身经历和知道内情的读者予以补充校正。

阎锡山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勾结的历史渊源

远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九年阎锡山留学日本的期间，就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冈村宁次（时为他的队长）、板垣征四郎（时为他的教官）、土肥原贤二（他的同学）等交结，尤其和土肥原过从甚密。

一九一七年，阎锡山仰承北洋军阀段祺瑞的鼻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通过段的中央陆军部，与日本驻北京的大仓洋行接洽，购买了一批军火，从而和这个实际上是日本驻华军人俱乐部的日本特务机关发生关系。他常派亲信官员梁上椿、南桂馨、苏体仁等，和这个日本特务机关——大仓洋行经理、日本浪人林龟喜不断往来，通过林龟喜，和日本军阀进行勾结。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期间，日本在津驻屯军司令官铃木高扬，接受阎锡山邀请，两度到山西与阎会晤，表面上说什么“参观山西的政治”，实际上是和阎锡山建立所谓“日阎亲善友好关系”。同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也先后来山西，和阎大讲“亲善”，阎待以上宾之礼。在此期间，土肥原借“旅行”之名，有计划地对山西的军事地理，作了详细的侦察。他曾亲身跋涉于

在险要要塞之中，雁门关、桑干河名川，都是他盗窃军事资料的要点。

一九二六年，南桂馨以阎锡山驻张作霖处代表之便，和在华北作阴谋活动的日本军方进行勾结，又令苏体仁（时为阎的日文秘书）经常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山村等人秘密往来。一九二八年，阎锡山参加国民党“北伐”时期，即令南桂馨在天津加紧和日军勾结，当时日军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新井和参谋三野，曾向阎担保：“只要山西军能够占领保定，日军就可保证不用山西军打一枪而取得京津。”后来，阎锡山果然倚仗日军，于同年六月八日进入北京。

一九三〇年，阎冯倒蒋失败，阎锡山被迫下野，避居大连，住在黑石礁的一所大楼内。他派靳祥垣、宋彻、李庆芳、张恺等秘密和日本关东军联系，并经常到关东军情报室，交换中国内部情报。他常和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晤面，指派李庆芳为联系人。经他们多次商讨，订立了密约三条：

- ①阎锡山赞助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全部；
- ②日本关东军支持阎锡山将来担任华北首脑；
- ③日本关东军军部将设法护送阎锡山返回山西，筹备一切。

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日本关东军派飞机将阎锡山从大连护送到大同，住山西骑兵司令赵承绶家里。他们谈到张学良时，赵有所顾忌，阎得意地说：“张学良将自顾不暇，哪里还能再管我们的事！”当他回到河边，与他的参谋长朱绶光谈到时局问题时，又说：“华北纵然被日本打进来，山西境内也不会发生什么战事。”

经过“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而阎锡山却派了邱仰濬、靳祥垣等同往日本，借考察村政的名义，秘密与板垣征四郎会晤，一方面对关东军护送他由大连返回山西重新执政，致以感谢

之意，另一方面恳求日军继续给予支持。当时板垣对邱、靳二人说：“只要阎锡山不作一切抗日准备，永远和日本亲善友好，日本今后仍然对他尽力支持，给予应有的帮助……。”因而，阎锡山闭口不谈抗日救国问题，而大叫什么“防共图存”、“亲日亦未尝无益”，同时提出什么“防共的两个根本大法”，与日军的“华北防共自治”大唱双簧。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中井飞太原，策动阎锡山加入“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时，日军在华北各大中城市遍设特务机关，阎锡山适应日军的要求，赞助日军在太原、归绥、大同等地，公开设立特务机关，在太原负责的为白井、归绥为羽山、大同为铃木重楼。他们专门搜集晋绥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并搜寻各县县志，盗窃古代文物，公开走私，制卖毒品，开设赌场，散布谣言，破坏社会秩序，到处横行霸道，无所不为。而阎锡山却嘱咐他的军政官吏好好应付，“不得和日本人发生冲突”。与此同时，阎锡山派他的参谋长朱绶光专负勾结日军的总责，还在天津设有秘密电台，与日军联系。

从这一段简略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抗战时期阎锡山勾结日军，随时准备公开投敌，不但是他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必然趋势，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是早有准备的。

下面我们就来叙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至日本投降以后，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

派遣文武官员投敌准备后路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阎锡山被迫卷入抗战洪流，骨子里却时时刻刻准备妥协投降，还在抗战初期，他就对他的高级干部说：“我们不能抬上棺材抗战。”汪精卫叛国后，高唱“和平”谬论，阎锡山即

加以响应，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他并且说：“天要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他估计蒋介石要投降，他要走在蒋介石前面）后来又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二日的“秋林会议”上，他更集阴谋投降妥协之大成，企图把整个山西拉上和平妥协道路，有计划地制造内部摩擦，大开妥协投降方便之门；提出了“无条件存在”的谬论和“狡兔三窟”的政策；提出“建立小国家”，强调“民族复兴”而反对“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以适应日本对中国“分而治之”、“以华治华”的狂妄野心。在组织上，成立了什么“精神建设委员会”、“政治突击队”、“敌区工作团”等等，并指使这些特务团体派遣大批“蛇蝎蝎蜓”（阎锡山派遣破坏分子到晋东南时训话中语）散布谣言，瓦解新军，打击牺盟会，解散动委会，对八路军也肆意攻击、诬蔑。在军事上，提出“训练重于作战”的口号，设立“晋绥军军官集训团”，传授什么“民族革命战法”，要“保存实力，避免牺牲”。

在这个时期，他秘密派遣他的文武官员公开投降日军，为他自己准备后路。太原沦陷后，山西第一任伪省长苏体仁，是阎锡山预先在天津安排好的。在苏体仁粉墨登场以后，阎锡山口口声声称道什么“苏先生”，他说：“苏先生早回太原去了，我想如果找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要郊迎十里。”又指使他的“高干”们对在秋林受训的人员说：“苏先生不是当汉奸，如果是汉奸，人家还给我们维持晋钞吗？”王靖国的第十九军第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在晋西柳林镇公开投敌，被日军任命为“兴亚黄军司令”。阎不下令声讨，反而通令不准说蔡是汉奸，并且经常派人和蔡雄飞联系，并暗使他的军队和日伪军接近，消除敌对情绪，建立所谓“亲善友好”关系。如暂编第一旅旅长崔道修与敌人秘密来往，副旅长李龙标，常到赵城城内与敌人联欢，敌人给

于大批的伪“联合准备银行”钞票，崔部士兵使用的都是这种伪钞。

哄传一时的临汾和平谈判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阎锡山以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的名义，派代表与敌酋清水师团长试行“和平谈判”。第十九军派的是梁培璜，第六十一军派的是吕瑞英（另一说这两代表都是由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杨贞吉等冒名顶替的）。他们到临汾刘村，找到苏体仁的代表苏静仁（伪山西省公署第一科科长）后，转介与清水师团长的山下参谋，谈判的条件如下：

第一、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实行反共。日军须从隰县、午城、蒲县、勐香镇等据点撤退，将来并将汾阳一带地区让与晋绥军驻扎。

第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

第三、日军须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

第四、山西各将领之住宅、财产，日军须完全交还。

这四条是日阎“临汾会议”的重要内容。其中把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队）”是阎锡山向日军提出的，表面抗日，实则反共，深得日军的谅解。事实上，不仅商定了条件，而且已见诸实施，在解放区就曾经由被俘的第十九军军官手里获得这种“抗日忠勇先锋队”图记。

日阎之间信使往还谋求所谓合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为了扫清投降道路，发动了反共、反新军的“十二月事变”（亦称“十二月政变”）。“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的投降妥协活动便更加明目张胆了。

一九四〇年初，太原日军特务机关派汉奸白太冲（山西孝义

白壁关人，原系阎锡山属下一个区长，投降后，阎委为第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兼平遥县县长，政训工作团团长），偕同日军嘱托（特务工作人员中的一种职名）小林高安，先到孝义兑九峪通过日伪“兴亚黄军”司令蔡雄飞的介绍，和驻隰县大麦郊之阎军警卫军军长傅存怀联系，接洽关于日阎两军“现地妥协，共同防共”的问题。不久，日军又派宪兵特务头子大矢亲自到吉县克难坡和阎锡山交换意见，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彼此‘合作’，消灭山西境内的抗日力量——八路军和决死队；并且实行‘物资交换’，互通有无。”

同年三月间，汉奸苏体仁、梁上椿等人，日夜奔走于日阎之间，力图促成日阎双方的所谓“全面合作”。阎锡山为了进一步取得日军的欢心，便将抗战初期所俘的两名日本兵，由其族孙阎立人秘密转送太原日本军部，以表示“合作诚意”。

四月间，日军根据阎锡山迭次提出的要求，口头答应：

- （1）将山西各将领在太原的住宅交还；
- （2）日军在中条山发动战事打胜后，阎锡山即可向太原前进。……

日军先将双池镇据点让给阎军驻防

六月间，日阎双方在太原秘密订立了一项《军事协定》。阎锡山派白太冲到隰县冯家港向骑一军军长温怀光作了如下之传达：

（1）日军决定：为了和晋绥军初步实施“合作剿共”之方针，即先将灵石境内之双池镇据点，交给晋绥军驻防；

（2）由骑一军速派一部分兵力连夜出发，以“佯攻”的形式，占领双池镇（对“佯攻”二字，阎锡山特别强调，其目的是为了遮掩人民群众的耳目）。

温怀光接到阎锡山的指示后，即令其骑一师师长赵瑞率领骑

三团向双池镇急进，并向双池镇外朝天打枪打炮十数分钟，得知日军早已退去后，才进入镇内。后以骑一军兵力不敷应用，遂将该镇交由独二旅艾子谦部接防。

日军向阎锡山提出《合作草案》

七月间，阎锡山令王靖国派其副官长刘宗康偕同第十九军第六十八师副师长兼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议张仲孚前往太原，通过蔡雄飞（张与蔡原系东北同乡）的介绍，会见了日军驻太原军部的小林参谋和筱壕参谋长。筱壕首先对张仲孚说：“本人从前在包头时，即和王靖国将军熟识，现在很愿通过王靖国的关系，早日和晋绥军达成友好协议，共同剿共”，随后提出一个《合作草案》：

“阎属第七集团军赵承绶部驻崞县、原平一带；第八集团军孙楚部驻临汾、运城一带；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部驻阳泉、娘子关一带。阎锡山的长官部驻太原，如果阎本人愿到北平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更为欢迎，太原长官部则由杨爱源主持。”日阎双方首先在军事上密切配合，进行剿共。

这个《合作草案》由张仲孚带回克难坡，交阎锡山考虑答复。后来，阎锡山感到全部投敌时机还未成熟：一来认为他的力量还不充实，如果公开投敌，必定遭受八路军、决死队的攻击而无力应付；二来又觉得对他的“组、政、军、经、教”所有干部做的“精神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在思想认识方面还不统一，内部力量的控制还不牢靠，如不经过一番“特别训练”、“强力组织”与“无情纪律”等等措施，就难以都随上他顺顺当当地去投敌。这是阎锡山所最担心的事。因而他对日军的《合作草案》的提议，不敢贸然答应，只是向日军提出要求，请先帮助他充实力量，尤其是充实“剿共”的军事力量后，再协商具体的“驻防问题”。

原来日军的阴谋，只是第一步先把阎锡山诱到太原，把他的

兵力分散到各处后，叫他当个“傀儡”罢了，因而对帮助他充实力量的问题，不感兴趣，经阎锡山再三要求，也未肯明确答复。

正在这时，日军由东京派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少将来到太原，授意驻太原的日本军部说：“只要阎锡山肯投降，要什么就答应给什么，暂时不必斤斤计较条件。”从此日阎之间互相勾结密谈，又继续活跃起来。

白壁关会谈与兑九峪和孝义城的“让渡”

十一月间，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属之白壁关，宣称在白太冲突中“摆香堂”，发展“青帮”收徒弟，实际上系按照阎锡山指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四项原则，与日军山西派遣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进行谈判（苏体仁、梁上椿列席）。当时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装做大商人的模样，以遮掩当地人民的耳目。他们彼此见面后，即行秘密会谈。会上，赵承绶代表阎锡山首先向日军提出具体要求，主要内容是：“先给晋绥军装备三十个团，所需兵员、武器、弹药、粮食、服装、经费等等，均请日方负责供给。”当时楠山秀吉即木田中隆吉的授意，予以答应，于是日阎双方迅速达成初步协议。

日军为了便于和阎锡山往来并进行诱降活动计，又于十二月间主动将孝义县西之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如来村等据点，让给骑一军接防，名之曰“让渡”。当该军接防上述据点时，阎锡山又指示温怀光亲率骑一、二两师，仍以“佯攻”的方式，向天空发射枪炮，力图表示用兵力“收复失地”，以掩饰和日军勾结的事实。不料竟因此牵怒于当地日军，认为阎军这种动作，有伤“皇军”威信，迟迟不肯按期“让渡”。温怀光慌了手脚，只得请白太冲向驻兑九峪的日军部队长再三道歉，一场小小风波，才告平息。

一九四一年三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偕同温怀光再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之若松旅团的高级参谋宫内中佐会商，达成如下协

议：

(1) 日阎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动，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尤其是前线部队要彼此友好往来，不得发生冲突；

(2) 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地区，对共之“防御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汾阳孝义以西之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以实行“会剿”。

在协议之后，赵承绶又要求日军将孝义县城，让给阎军接防，作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条件。当时宫内答以须向太原军部请示后，再行答复。

同年六月，日军通知阎锡山，愿将孝义县城，再行“让渡”。但附带声明：这是为了双方友好，日军才答应将孝义城“让渡”给阎军。因此，阎军不得再沿用对双池、兑九峪的佯攻故技，不得对外宣传说将孝义城“攻下”，再次损伤“皇军”的威望。如果这样，“皇军”必将断然再把孝义城收回。

当温怀光率领骑一军军部和所属骑二师(师长沈瑞)的部队进驻孝义城后，日军曾派了两名便衣宪兵，进入该城，视察该军有无“攻下孝义”之虚伪宣传。温怀光曾一再向该宪兵提出绝无此种宣传的保证，并待以上宾之礼。

不久，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也搬入孝义城内。从此日阎之间，信使往还，更加频繁。阎锡山的妥协投降活动，遂成为公开的秘密。

阎锡山为达到投敌目的对部下 所作的“精神准备”

阎锡山为了欺骗他的部下，跟上他投敌叛国，于日军“让渡”孝义县城的前后，大办“暑期进步训练”又名为“洪炉训练”，将他的所有大小文武官员，分批轮训。在训练中特别提出“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汉奸论调，并要求受训人员

一定要“言会长（民族革命同志会会长阎锡山）之言，行会长之行，志会长之志”。同时又提出“要跳黄河大家一起跳黄河”的集体投敌的无耻口号。

阎锡山还亲自给受训人员灌输亲日降日思想，他说：“目前以至将来世界的趋势，一定要实行‘洲同盟’，如‘亚洲同盟’，‘欧洲同盟’、‘美洲同盟’，而各洲又必须共同拥戴一个盟主来做领导。说到亚洲的盟主，舍日本而外，任何国家都担任不起，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一定都要推日本为盟主，才能不受英美等强国的欺侮，才能防止苏俄‘赤化’的危险。”

同时，他还叫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副会长赵戴文和其他“高干”人员每天早晨在“洪炉台”上对文武官员讲话，建立所谓“会长”的威信。赵戴文曾说：“中国的圣人，中国的文化继承者，上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孙中山而外，再往下是谁呢？不用说就是我们的‘会长’！我们一定要同‘会长’一个鼻孔出气……。”他还作了个比喻说：“从前有个学者，路过华山，华山的门哗啦一声开了，从中走出一个白须老人，谓学者曰：‘华北有异人出世，西至嘉峪关，东至于海，北至大青山，南至于河（黄河），异人在此空间，大有作为，授尔天书三部，以扶异人，好自为之！’——这异人就是苻坚，学者就是王猛。今日的异人（圣人）舍‘会长’其谁欤！”赵戴文把阎锡山比作苻坚，把他自己比作王猛。并说：“我和‘会长’，君臣之分定矣！”赵戴文在讲话中所指的区域，正是阎锡山妄想在日本的羽翼下，做华北“儿皇帝”的区域。

阎锡山还授意他的高干们，到处为他吹嘘宣扬说：“会长一切都有办法。不久即担任华北的大任务。”又说：“会长是广求出路的，从来没失败过，大家一齐跟上会长走，没有错。”

阎锡山还经常盛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用法西斯的办法，令他的军官和政工人员加入他的军队核心组织——“铁军组织”

(山山铁血团)，并在红绸子上写着四句“箴言”：“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同生死利害，共子女财产。”

与此同时，阎锡山还组织了个文人组织“进步保证会”。又组织了“敌工团”、“铁纪团”、“服务士队”、“流动工作队”、“进步总社”(红帮)、“进步委员会”(青帮)等等千奇百怪的反动组织。

这一系列的反动组织成立后，阎锡山便不止一次地对他那些文武高干们威胁说：“我看你们往哪里跑？我要是成功了，叫你们跑也跑不掉；我要是失败了，也得把你们一齐先杀掉！”

阎锡山唯恐他的部下脱离他，背叛他，因此，凡有违背他的意旨、不服从他的命令或对他稍有不满意表示者，除以所谓“国法”和“军法”严加判刑外，还特别强调用所谓“组织纪律”(组织制裁)的法西斯残酷手段任意处死。并且强迫被“制裁”的人，在临死之前，还得写下“悔过书”。

例如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将官——第七十师师长刘墉之(河北唐唐人)，曾对阎锡山表示不满，被“组织制裁”——迫使其服以过量的麻醉剂(土的年)，然后又以浸过水的麻纸，层层贴在面部而窒息。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汾阳协定》的内幕

当阎锡山对他的内部作了一番“精神准备”工作以后，就毫无忌憚地同日本帝国主义正式订立《晋绥军与日本军停战协定》(也称《基本协定》，又称《汾阳协定》)。

一九四一年八月初，阎锡山密令赵承绶作为全权代表(阎亲笔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信笺上写着：“兹派赵承绶为全权代表”等字句)前往汾阳城内替他在已经打印好的《协定》上签字。赵承绶于八月十一日偕同温怀光、白太冲、刘迪吉、续志仁(第七集团军参谋长)、齐骏鸣(骑一军参谋长)和赵瑞等人，由

孝义城秘密出发，他们通过自己防地的哨兵线时，诡称到前方侦察地形，随后急速向北驰去，行至田屯镇（日军在汾阳、孝义间的一个据点）约五、六里的地方，看见路上没有行人来往，即下了马，进入路旁的青纱帐内，将身上的军装脱下，换上便衣（在汾阳连夜赶制的长衫马褂），悄悄地溜入田屯镇。

这时，有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茂川中佐和“山西派遣军”参谋土田少佐等出来迎接，旋即陪同赵承绶等乘坐小汽车驰往汾阳城内，住入日本旅馆（临时招待处）。这时，苏体仁、梁上椿等人也住在该旅馆内，当晚和赵承绶谈论“签字问题”，并转达日军的意见：指定赵承绶和温怀光两人，“在签字仪式”上，必须身着国民党军服，请勿穿便衣，以示“郑重”。当时赵、温二人，大为狼狈。因为他们的呢子军服和马靴、武装带、“军人魂”（短剑）以及军衔章等等装潢门面的东西，在抗战开始逃命时，早已丢得一干二净了。

翌日上午九时，他们只得又穿上平素所着的灰布旧军服（什么配件都没有），仍由茂川、土田迎接至“若松旅团”司令部，和日军代表、“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中将与“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以及旅团长若松少将等日酋见面。彼此寒暄后，赵承绶提出一个临时要求：“在签字仪式上，无论如何，请勿照像！”诸日酋狞笑未答。

十时正，日酋率其参谋人员，先登上签字会场（汾阳城内南水井三号屋顶花园），端坐正面，俨然以战胜者自居。赵承绶、温怀光率其随员以及苏体仁、梁上椿等“中介人”陆续进入会场，坐入指定席位。这时，会场上悬挂着日本太阳旗（在上）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在下）。不一时，签字仪式开始。会场周围环列着十多名日军宣传班的军官，带着大小照像机、摄影机和录音机，连忙“动作”起来。赵承绶等连忙躲闪，已来不及。他们坐定后，日酋田边盛武首先拿出冈村宁次的指派书（书中着重指

明和阎锡山签订停战协定，内容颇为详尽具体），与赵承绶交换。阎锡山的指派书（即阎亲写的十多个字的证书）。这时，日酋对阎锡山如此简单而又笼统的指派书，极表不满，但又来不及予以纠正，只得仍按预定程序往下进行。接着双方代表就在用日、中两种文字打印好的《停战协定书》上面签字。这个《协定书》上的开头写着“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所谓“合作原则”，并明确提出日阎双方要“彻底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化干戈为玉帛”，实行“亲善友好”，“共存共荣”。

在这个《协定书》上还写着双方具体要求，其大意如下：

（甲）阎锡山向日本提出的要求，

（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五万支，轻机枪五千挺，重机枪五百挺，子弹按配赋数随发；

（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二千万元，另给阎本人机密费七百万元；

（3）阎方部队给养，由日方拨给；

（4）日方先拨给阎方五十个团的壮丁，使阎方充实统治山西的力量，尔后根据形势的发展，继续再拨给五十个团的壮丁，充实阎方统治华北的力量；

（5）日方将山西的政权，交给阎方，由阎方派人陆续接任各县县长职务。

（乙）日本向阎锡山提出的要求，

（1）阎方即刻通电全国，脱离重庆政府，发表“独立宣言”；

（2）阎方将小船窝黄河渡口，交给日方派军驻守；

（3）阎方营以上军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

（4）阎锡山本人第一步进驻孝义，日方将晋中政权交阎接

管；第二步进驻太原，日方将山西其余政权（雁北除外）交阎接管；第三步阎锡山进驻北京和汪精卫“合作”，阎担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5）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由阎锡山组织“华北国”。

阎下令绝对不准和日军发生冲突并 构筑大规模的防共工事

阎锡山为了履行《汾阳协定》中所规定的日阎之间“彻底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实行“亲善友好”，便严令他的前线部队“绝对不准对日军开枪射击，以致发生冲突，违者除对该部队主管严加惩处外，所有消耗弹药，一概不准报销，并应负责加倍赔偿相应的弹药费。”阎锡山又于八月下旬，令赵承绶派一个团到敌占区进行活动。赵承绶接令后，便将骑二师第五团团团长杨诚叫来，亲口下令说：“我方已由白太冲和汾阳的日本人联系妥当，由我部派一个团到介休之东西段屯，再经介休城北到义安，过铁道，进出介休南方高地，西行抵义棠，最后返孝义。”又说：“这次行动主要的目的是：对八路军作‘威力侦察’，不得与日方发生冲突。”杨诚受令后，即率该团出发，当到达东西段屯以后，驻介休的日军即向杨诚节节前进，形成包围攻击的态势。杨诚命令部队只取防御态势，不准开枪射击，并与日军的一个中队长联系，说明来意“共同防共”，日军旋即退去。当杨诚返回孝义向赵承绶复命时，赵对杨“未与日军冲突”，表示十分满意。后来杨诚被提升为骑四师师长。

阎锡山为了早日实现《汾阳协定》的规定——日军允许他“第一步进驻孝义”，特令温怀光负责在孝义城外构筑大规模的防共工事，并亲口指示杨诚（当时在克难坡受训）说：“除加强孝义原有城墙外，再在城外构筑坚固的‘围廓’、‘复廓’、‘外

‘三道阵地’，‘外廓’到城墙的距离，一定要在火炮射程以外，不使城内落一颗炮弹！”又说：“这样的防共工事，应连夜赶筑，越快越好，越坚固越好！”最后，阎锡山狂妄地对杨诚说：“你回去告给温军长说，在孝义防共工事完成后，要领上共产党去参观，并且告他们说，来来来，你来打！看你能把我怎样？！”

温怀光为了完成这个防共工事，曾迫令所属骑一军全部士兵和孝义县全县民工，忍饥受寒，流血流汗，昼夜不停地动工构筑了半年以上，才算初步完成。

日阎进一步签订《合作条款》

十月一日，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及随行人员梁毓武、刘迪吉、白太冲、续志仁、齐骏鸣、贾锡九（荆谊）和张永智等多人，由孝义经汾阳到达太原，住典膳所二号“茂川公馆”，和日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的代表楠山秀吉进行关于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也称《日阎合作条款》）的谈判。这时，日军拨给赵承绶专用电台一部，以便随时和阎锡山直接联系。收发电报和译电工作由曾若虚、杨英斋担任。赵与楠山谈话时，由苏体仁的女婿杨宗藩（伪省公署日文秘书）担任翻译，其谈判要点如下：

（1）阎军为了和日军便于联系，避免冲突，互通情报，交换物资，共同防共起见，应分别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

（2）交换情报：双方部队经过“办事处”互相交换有关八路军、决死队等抗日武装活动的情报。驻孝义之骑一军经汾阳办事处与汾阳日军旅团部联系；驻临汾西山之第六十一军经临汾办事处与临汾之日军师团部联系；运城也如此。

（3）交换物资的项目：阎方以桐油、水银、生漆、桃仁等换取日方纸张（包括报纸、印票纸、卷烟纸）、西药品、布匹等。